

中译本前言

民国外交元老颜惠庆先生用英文撰写的自传首次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了。

这部自传完稿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作者在“后记”中写道:“我的这部自传,也许简单平实,但所反映的时代,却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重要时期,读者不难从字里行间受到启发,纵使不能借此对中国的未来作出判断,也肯定会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认识。”诚如斯言。该自传不仅展现了民国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披露了很多不见于史书的细节。对于治史者,它是弥足珍贵的史料,可以推进民国史的研究。对于一般读者,它是一段娓娓道来的人生历程,使人们宛若走入悲怆的岁月,从那波澜起伏的往事中审视社会的变迁。

颜惠庆先生,字骏人,1877年4月2日出生于上海虹口。颜氏祖籍山东,后迁居福建厦门。清朝道光初年,因避战乱,复迁上海。颜惠庆的父亲颜永京曾于青年时赴美留学;归国后,参与创建圣约翰书院,并任学监;晚年,专任上海虹口圣公会天主堂教区牧师。

童年时代的颜惠庆,读过一段私塾后,转入教会所办的英华学塾,后来又就读于英人开办的同文书院。1895年,父亲送他前往美国读书。5年后,颜惠庆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回国后,他执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兼任商务印

书馆和《南方报》的编辑。1906年10月,颜惠庆赴北京,参加清廷首次举行的游学欧美毕业生考试,名列第二,赐进士出身(译科)。

1908年2月,颜惠庆经自荐,被聘为二等参赞,随同伍廷芳出使美国,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驻美期间,他不但积累了从事外交工作的实践经验,而且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系统地进修了外交理论和国际法知识,为成为卓越的职业外交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09年冬,颜惠庆应召回国,在外务部任主事,供职于新闻处,负责接待驻京外国记者,并协助发刊英文《北京日报》。翌年,参加清廷举行的游学生殿试,授翰林院检讨,升任参议,兼任清华学堂总办。1911年,参加中英禁烟问题谈判,使英国政府承认了禁烟原则。11月,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后,升任外务部左丞。

民国建立后,颜惠庆任唐绍仪内阁外交部次长。1903年,他出使欧洲,任驻德国、瑞典、丹麦三国公使。1920年,他辞去三国公使职务,返回国内。8月11日,颜惠庆出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此后,曾三次出任此职,数次兼、代、署理国务总理。1926年5月,在奉系的逼迫下,颜惠庆辞去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的职务,隐退于天津。

在北京政府任职期间(包括出使欧洲),颜惠庆曾以中国代表团顾问的身份出席了巴黎和会(1919年),筹备、组织了中国代表团参加华盛顿会议(1921年),参与了北京关税特别会议(1925年)的谈判;为收回日本在山东攫夺的权利和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斡旋于西方列强之间。他任外交总长时,曾奉令宣布停止沙俄驻华使领待遇,废止沙俄在华特权(1920年);主持废止了中日军事协定,并与德国签定复交条约(1921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急于起用一批北京政府时

代的外交官,开展国联外交。颜惠庆应召抵南京,被任命为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11月,被任命为驻美公使,赶赴华盛顿。未及正式上任,又被任命为中国驻国联代表团首席代表,前往日内瓦。在1932年1月召开的国联会议上,他援引国联盟约有关条款,提交了日本侵略中国案,促请国联大会和行政院制裁日本。2月19日,颜惠庆在国联大会上,痛斥日本的侵华行径。他用英语作的演说,流畅地道,锋利有力,取得了极大成功。同年春天,国际裁军会议也在日内瓦开幕,颜惠庆被任命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会议。会议期间,他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积极接触,秘密谈判中苏复交问题。终于在当年12月,于24小时内办妥了复交手续。消息公布后,震惊了世界。

1933年1月31日,颜惠庆被任命为中国驻苏联大使;直到1936年3月,因对南京政府政策的不满,他辞去了大使职务。回国后,在上海主持难民救济与伤兵救护工作,出任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后来,又当选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主席团成员。

1939年8月,颜惠庆被任命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出席在美国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大会。利用这次机会,他以特使身份,两次谒见罗斯福总统,以促成美国对华经济援助、贷款和制裁日本。他频繁拜访各界政要以及老同学和朋友,大力宣传中国的抗战。此间,蒋介石曾致电颜惠庆,邀其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被他婉言拒绝。

1940年3月,颜惠庆从旧金山乘船抵达香港,因上海已被汪伪政权所控制,只得羁留于此。翌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乔装成难民的颜惠庆被日军认出,软禁于香港酒店。日军两次请他出

山,施以威胁利诱,都遭到了他的严词拒绝;最后,只好把他押返上海。

抗日战争胜利后,颜惠庆被选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由于对国民党的统治早已失去了信心,他经常托病,不去南京开会。

1949年2月,颜惠庆受代总统李宗仁的委托,赴北平与中国共产党商谈和平事宜;并前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

解放后,颜惠庆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等职。1950年5月24日,他病逝于上海,毛主席和周总理特电其家属致唁。

颜惠庆先生不仅对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外交卓有贡献,而且,在发展现代文化教育事业方面也多有建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执教期间,他主持编辑了《英华大辞典》,严复为该书作序,于190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中国驻美使馆担任参赞时,他奔走于当地各出版机构,为商务印书馆联系引进教材问题。在北京任职时,他最早参与筹办清华学堂。后来,又主持成立了清华学校基本金委员会和校董会,使清华学校的发展走上正轨。他对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建立、现代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1920年代,他参加发起组织了欧美同学会。

颜惠庆先生热心于发展民族企业。在寓居天津期间,他应邀担任多家公司的董事或董事长。1929年天津大陆商业公司创立,他出任董事长。凭借着他与海外华洋工商界的广泛联系,使这家公司迅速地打入了国际市场。此外,他还曾担任天津大陆银行的董事长;对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庆丰面粉厂、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制碱厂等企业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颜惠庆先生的一生,适逢一个风云激荡、新旧递嬗的时代;无论中国还是世界,社会环境和世态风俗都处在沧桑变化中。丰富的阅历,使他的自传犹如五彩斑斓的画卷,描绘下了流逝的历史时光。因而,他最初用英文发表的自传,题目是《东西方万花筒》(*East-West Kaleidoscope*)。从自传中,我们可以看到:1880年代的上海既有十里洋场的喧嚣,又有南市旧城的古雅;既有跑马厅骏乘角逐,又有江湾镇龙舟竞渡。我们还可以看到:宣统二年(1910年),清廷举行留学生殿试时,保和殿内挂满了缝有假辫子的官帽的奇特景象。辛亥革命后,古都居民措手不及,竟不知在脱去长袍马褂后,穿什么样式的衣服;政府官员也不知上下级如何称呼。北洋军阀时期,天津寓公的出现,以及他们形形色色的生活。此外,我们还可以沿着当年颜惠庆先生的海外旅程,一览欧美大陆的人情世态。可以看到19世纪末美国乡村小镇的各类居民——英国旧家、帝俄贵胄……,以及当地妇女衣着的保守和男士的贪杯豪饮。还可以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的灾难:当时的柏林,物资奇缺,所谓咖啡乃系烘干的苹果皮捣碎而成;白糖完全绝迹,代以细粒人造糖精。为了解决军火的不足,居民必须将家具上的金属品拆下捐献,尤以铜类金属最为需要。诸如此类的世间百态,确实像万花筒变幻出的奇异影像。然而,它们折射的却是重大的历史事件,使人们感觉到的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沉重步履。

颜惠庆先生的自传只记述到1941年底。为了使读者了解他晚年的重要活动,我们将他于1949年1月28日至2月27日写的英文日记译成中文,附在正文后。这是一份值得关注的珍贵史料,由颜惠庆先生的女儿颜彬生女士提供。日记详细记载了颜惠庆先生率李宗仁私人代表团赴北平与中国共产党商谈和平事宜的过

程,特别是他赴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接见的场景。尽管他来自旧营垒,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不了解和不理解之处,但是,凭着正直的精神和敏锐的观察力,他为解放区的欣欣向荣深感欢欣鼓舞,为能见到毛泽东、周恩来而激动不已,赞誉之情洋溢在字里行间。这正是他后来拒绝去台湾、坚持留在大陆的原因。

颜惠庆先生在自传后记中,深情地提到这样一件事:他的父亲于花甲之年讲道:“孩子们,我很遗憾在我的有生之年将看不到国家的富强。但是你们比我幸运,应该能看到新中国的诞生!”这是那些最早接受西方文化同时又为祖国的积弱而痛心疾首的先贤们的共同心声。折冲玷坛几近半个世纪的颜惠庆先生,终于像他的父亲所期望的那样,见到了新中国的曙光。

吴建雍

2002年6月27日